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理论体系、实践路径与辩证方法论

——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的文本分析

李昌奎
香港产教融合研究所

摘要 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系统性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作为最权威、最基础的第一手文献，为深入研究这一思想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系统梳理该思想的逻辑结构与实践指引：一是揭示其以“两山”理念、生命共同体系统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和“美丽中国”目标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二是总结其在制度建设、污染防治、流域治理、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战略实践路径；三是阐释其在处理发展与保护、攻坚与协同、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外部约束与内生动力、“双碳”承诺与自主行动等重大关系中所体现的辩证方法论；四是探讨其对全球环境治理与地球生命共同体构建的世界意义。研究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科学性与实践性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既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美丽中国；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70401> **文章编号** 2664-1127.2025.0704.1-12

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成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制度创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不仅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收录了自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79篇重要著作，是系统学习和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权威、最基本的

第一手文献资料。本文以该文选为核心研究文本,运用文本分析法,结合相关政策文件与权威数据,旨在系统性地解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文章将从四个维度展开:首先,剖析其由“两山”理念、“生命共同体”系统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观和“美丽中国”总体目标构成的核心理论体系;其次,梳理其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污染防治攻坚战、大江大河治理、绿色低碳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战略实践路径;再次,深入阐释其在处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等五对重大关系中所蕴含的精髓辩证方法论;最后,探讨其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世界意义。通过此研究,以期更为深刻地揭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系统性与强大的实践指导价值。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论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通过对《文选》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其理论体系主要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以及“美丽中国”的目标论这四大核心理念构成。这四大理念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指导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

(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价值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简称“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理念,它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根本上扭转了将二者对立割裂的传统观念。

1. 文献溯源与内涵演进

“两山”理念的完整表述,在《文选》中首次出现于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此之前,2013年4月在海南考察时,他已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为“两山”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2014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他再次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强调“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这一理念的内涵是动态发展、层层递进的。首先,它体现为一种价值抉择,即“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明确了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时,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取舍,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其次,它追求一种理想状态,即“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进。最终,它揭示了一条转化路径,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明了生态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生态财富能够带来经济财富的内在机理。浙江安吉余村从“靠山吃山”的采矿经济转型为发展生态旅游的“美丽经济”,就是这一理念从地方生动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典型缩影。

2. 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两山”理念的提出,不仅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诠释,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传统经济学往往将环境视为生产活动的外部成本,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来内部化。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质上是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一要素,从生产的外部条件提升为生产力的内在构成部分。优美的“绿水青山”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巨大增值潜力的特殊“劳动对象”(如生态旅游资源)和“劳动资料”(如清洁的水源和空气),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这一理念超越了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将生态资本的保护和增值视为发展生产力的新动能和内在要求,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价值遵循。

(二)“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整体主义的系统生态观

如果说“两山”理念解决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问题,那么“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

的系统思想则为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这一理念强调必须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内在规律出发，进行统筹治理。

1. 文献溯源与内涵演进

这一系统思想的提出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2014年3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并形象地阐述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这一论述要求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对生态要素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深入，这一理念的内涵不断扩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这一表述扩展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最终，在2021年3月以后关于“三北”工程和荒漠化防治的论述中，明确加入了“沙”的元素，形成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完整表述。这一演进过程，精准地反映了中国生态治理战略的深化与扩展。最初的“山水林田湖”主要涵盖了传统农耕文明区域的核心生态要素；“草”的加入体现了对草原退化问题的高度重视；而“沙”的纳入，则标志着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特别是荒漠化防治，被提升到与山水林田湖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覆盖我国所有主要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大生态观”和系统治理框架。

2. 理论的哲学基础

“生命共同体”理念植根于深厚的哲学思想。一方面，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系统整体的观点，认为生态系统各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任何单一要素的破坏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崩溃。另一方面，它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活动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崇高价值追求，它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鲜明特征，为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描绘了美好蓝图。

1. 文献溯源与核心内涵

这一理念贯穿《文选》始终。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他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至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这一理念被正式定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标志着其理论地位的最终确立。

其核心内涵在于深刻批判并决心超越西方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竭泽而渔”的老路。《文选》开篇即指出，走美欧老路，“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是“难以为继”的。文章深刻反思了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强调“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旨在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2. 理论的世界意义

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这不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根本性超越，更是在全球现代化叙事中注入了蕴含东方智慧和中华文明底蕴的中国方案。它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昭示，现代化并非只有一条路径，完全可以在保护生态、传承文明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可供借鉴的现代化范式，极大地增强了中国道路的全球吸引力和道义感召力。

（四）“美丽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美丽中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描绘的宏伟蓝图，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愿景。它

将抽象的生态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可及的奋斗方向。

1. 文献溯源与核心内涵

“美丽中国”的概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并迅速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和行动。《文选》中的《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等篇目，对其内涵进行了系统阐述。

“美丽中国”是一个综合性、多维度的目标。它不仅指向“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自然生态环境，更涵盖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形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文明新风尚。它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生态维度的集中体现和最终落脚点。其核心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优美生态环境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战略部署与时间表

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文选》中勾勒出清晰的战略步骤和时间表。以 2020 年为节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到 2035 年，生态环境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战略规划体现了久久为功的战略耐性和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担当，确保美丽中国建设一张蓝图绘到底。

表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理念提出与发展年表

核心理念	提出时间	对应《文选》篇目	核心论断/内涵演进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2012 年 12 月	《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提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2013 年 4 月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将生态环境问题上升为民生福祉的核心内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3 年 9 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首次完整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	2014 年 3 月	《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	首次提出系统治理思想，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2016 年 1 月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根本遵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17 年 10 月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十九大报告中确立为新时代基本方略之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019 年 9 月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将黄河治理提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020 年 10 月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明确生态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本质特征。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	2021 年 3 月后	《坚持正确生态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系统观扩展，将“沙”纳入，体现对荒漠化治理的重视。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2024 年 1 月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深刻揭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属性，统筹发展与环保。

二、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深刻的理论体系，更是指导实践的强大武器。《文选》详细擘画了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国家治理行动的战略部署与实践路径，主要体现在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保障、以污染防治为关键战役、以流域治理为系统示范、以发展转型为治本之策的“四轮驱动”格局。

（一）制度保障：“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构建与深化

《文选》反复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这构成了生态治理的根本基石。

1. 顶层设计与机构改革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是一场深刻的治理变革。其核心在于解决长期存在的“九龙治水”、职责交叉、地方保护主义等体制性障碍。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组建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是这一变革的标志性举措。此举旨在实现对山水林田湖草沙所有自然生态空间的全要素、全流程统一监管，具体体现为“五个统一”：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这一系统性整合，从根本上重塑了国家生态治理架构，为实现系统治理和整体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2. 环保督察的“利剑”作用

为确保制度“长出牙齿”，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应运而生。《文选》将其定位为“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督察的威力在于其高规格的组织领导、坚持问题导向以及敢于动真碰硬的决心。通过“下沉”督察、受理群众举报、公开曝光典型案例等方式，督察实现了对地方生态环保工作的全面“政治体检”。例如，针对云南玉溪杞麓湖污染治理不力问题，督察不仅曝光了其“治标不治本”的乱象，更推动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29名责任人的严肃追责问责，真正做到了“见人见事见责任”，有效压实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这种常态化、制度化的外部强力约束，极大地改变了过去一些地方“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现象，推动了生态环保责任的落地生根。

3. 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激励

在强化外部约束的同时，制度建设也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激发内生动力。《文选》提出，要“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良性局面”。其目的是解决“保护生态的不吃亏”的问题，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跨省流域的安徽、浙江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就是一个成功范例。该机制通过设立补偿基金，约定“谁超标、谁赔付，谁达标、谁受益”，有效激励了上游安徽黄山市加大水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力度，保障了下游浙江千岛湖的水质安全，实现了上下游的互利共赢。这一模式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生态治理手段从单一的行政命令向行政、市场、法治等多元工具协同发力的现代化转型。

（二）重点战役：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进与成效

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文选》明确提出，必须以攻城拔寨的拼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这是一场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和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关键战役。

1. 战略部署与战役布局

2018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核心目标，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七大标志性战役，包括：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水源地保护攻坚战以及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这一“战役式”的部署，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解决主要矛盾的战略思想。它将宏大的环保目标分解为具体、可操作、可考核的战役任务，并锁定重点区域（如京津冀）、重点领域（如柴油货车）、重点问题（如黑臭水体），体现

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原则。这种组织模式有效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短期内迅速扭转了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

2. 显著成效与数据支撑

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重大转折。权威数据显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蓝天保卫战，全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23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降至 30 微克/立方米，相比 2015 年的 46 微克/立方米显著下降。重点城市 PM2.5 平均浓度相较于 2013 年累计下降了 57

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显著向好。2023 年，全国地表水优良（I-III 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9.4%，较 2015 年的 66.0% 大幅提升；劣 V 类水质断面比例则从 9.7% 降至 0.7%。长江干流连续 4 年、黄河干流首次实现全线水质达到 II 类优良水平，“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景重现。

净土保卫战，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如期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彻底终结了“洋垃圾”输入历史。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1

这些数据雄辩地证明，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其成效是实实在在的，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表 2: 污染防治攻坚战主要指标变化（2015—2023 年）

领域	指标	2015/基线年数据	2023 年数据
蓝天保卫战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	46 微克/立方米 (2015)	30 微克/立方米
	重点城市 PM2.5 平均浓度累计降幅	-	57%（相比 2013 年）
碧水保卫战	全国地表水优良（I-III 类）水质断面比例	66.0% (2015)	89.4%
	全国地表水劣 V 类水质断面比例	9.7% (2015)	0.7%
	长江干流水质	总体 III 类，部分 IV 类	连续 4 年全线 II 类
	黄河干流水质	部分 III 类及以下	首次全线 II 类
净土保卫战	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	进口大量“洋垃圾”	如期实现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	达到 91% 以上

（三）流域治理：“长江大保护”与“黄河大战略”的系统实践

长江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生态状况事关国家发展全局。《文选》将两大流域的保护与发展提升到国家重大战略层面，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系统思想在宏观区域治理上的集中体现和生动实践。

1. 长江大保护：修复与转型

针对长江流域长期以来存在的“化工围江”、岸线无序开发、水生生物多样性衰退等“病症”，《文选》开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根本药方。这一战略的核心要义是“修复”，即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倒逼发展转型。关键举措包括“十年禁渔”和系统治理。作为一项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大决策，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暂定期限十年的常年禁捕。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成效显著。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2022 年达到 1249 头；长江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 II 类；23.1 万退捕渔民得到妥善安置和就业保障，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统筹推进非法码头整治、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系统性工程，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存量、遏制污染增量。

2. 黄河大战略：保护与约束

与长江的“过度发展”问题不同，黄河流域面临的核心挑战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生态系统极为脆弱、水土流失严重等“先天不足”的问题。因此，《文选》为黄河治理确立了“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其核心要义是“约束”。关键举措包括：“四水四定”，即“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将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系统治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上游重在水源涵养，中游重在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重在湿地保护和生态廊道建设，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对两大流域的差异化战略部署，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科学方法。它将“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从理论层面精准地应用到实践层面，为不同生态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区域如何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典范。

（四）发展转型：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与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文选》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实践的深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重大论断，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

1.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文选》从一开始就强调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要求从生产和消费两端发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核心举措包括推动能源革命，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广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全民行动。

2. 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统一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所谓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有高科技含量、高效率 and 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核心在于摆脱依赖大量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路径，推动经济社会走向创新驱动和绿色转型。它与绿色生产力的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内核的绿色性。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赖于绿色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以及人工智能赋能下的节能减排技术。这些前沿科技的共同特征在于以低碳、减污、高效为导向，将绿色发展嵌入到生产力的底层逻辑之中。

第二，产业形态的绿色性。新质生产力所孕育和壮大的，是以绿色制造业、绿色服务业和绿色能源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些产业不仅具有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更在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方面呈现出“低投入、低排放”的结构特征，成为引领经济绿色转型的主导力量。

第三，发展目标的绿色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实现绿色转型，服务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达成，从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也是绿色发展的现实路径。

这一论断实现了对生产力范畴的创新性升华：它突破了将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外在成本约束”的传统思维模式，而是把绿色发展确立为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核心动能。这为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引，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辩证方法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引和明确的实践路径，更贯穿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这种辩证方法论是其科学性与指导性的根源所在。《文选》中，尤其是在2023年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正确处理的五对重大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的辩证智慧。

(一) 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协同关系

传统发展模式常常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视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对立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彻底破除了这一二元对立思维,强调“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这背后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刻运用。

这对关系中,“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而“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保护”的目标和结果。二者在对立中统一,在统一中发展。一方面,高水平保护通过严格的环保法规、生态保护红线、环保督察等外部约束,淘汰落后产能、遏制粗放扩张,为绿色、低碳、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腾出了宝贵的资源、环境 and 市场空间。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本身内含着绿色发展的要求,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能源革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和资源消耗,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生态保护。实践中,正是通过环保倒逼产业转型,才催生了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实现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二) 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统筹关系

生态环境问题复杂交织、成因多样,治理起来千头万绪。对此,《文选》提出了“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相结合的方法论,体现了抓主要矛盾和坚持系统论的辩证统一。

“重点攻坚”要求我们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污染防治攻坚战部署,特别是针对PM2.5、黑臭水体等标志性战役,就是“重点攻坚”的生动体现。它避免了平均用力、眉毛胡子一把抓,能够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提振社会信心。“协同治理”则源于“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要求我们在治理某一具体问题时,必须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例如,治理大气污染不能仅盯PM2.5,还要协同控制臭氧;治理水污染要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将重点攻坚的“尖刀突破”与协同治理的“系统推进”相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策略。

(三) 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互补关系

在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问题上,是完全依赖自然还是过度依赖人工,是长期存在的争论。《文选》辩证地提出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针,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该方针的核心是“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这承认了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是最高效、最经济、最可持续的修复方式。它要求我们首先要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给大自然留下足够的休养生息时间和空间。长江“十年禁渔”就是典型的范例,通过减少人为干预,让长江水生生态系统得以自然恢复。同时,该方针也并未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那些生态系统受损严重、退化剧烈、仅靠自身难以恢复的区域,必须辅以科学、适度的人工修复措施,以加快恢复进程。中国长期坚持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等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就是人工修复的成功典范。二者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能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

(四) 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驱动关系

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也需要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文选》辩证地处理了“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体现了外因与内因辩证关系原理的运用。

“外部约束”主要指“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通过中央环保督察、严格执法、严肃问责等强有力手段,形成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解决的是一些地方和企业“不想为、不愿为、不敢为”的问题,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刚性保障。这是变革的必要外部条件。“内生动力”则源于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和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通过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消费,特别是让人民群众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能够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外部约束为内生动力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和压力,而内生动力的增强则使外部约束的执行更为顺畅、成本更低。二者

相互促进，共同驱动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

（五）“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平衡关系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向世界作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如何处理好履行国际承诺与保障国家发展利益的关系，考验着战略智慧。《文选》对此提出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相统一的原则，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中国坚定不移地履行承诺。“双碳”目标“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这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也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仍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双碳”目标任务极其艰巨。因此，《文选》明确强调，“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必须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坚持“先立后破”，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坚决反对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运动式减碳”。这种辩证平衡，既维护了多边主义和全球气候治理的大局，又牢牢把握了自身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全球贡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纲领，其深邃的哲理和成功的实践也日益超越国界，为破解全球环境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彰显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从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到引领者的角色之变。

（一）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提供了深刻的理念指引和务实的行动方案。

1. 理念贡献：倡导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在全球治理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宏伟倡议。这一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生态领域的延伸和具体化，深刻揭示了全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休戚与共的共同命运。它强调，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各国应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此理念指引下，中国积极倡导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张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这一系列中国主张，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建设性力量。

2. 实践贡献：提供可借鉴的中国范例

中国不仅是全球生态文明的倡导者，更是坚定的行动派。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本身就是对全球环境治理的最大贡献。中国在污染治理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决心。过去十年间，中国以壮士断腕的力度向污染宣战，在较短时间内有效遏制了环境恶化趋势。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从2013年到2021年，全球污染水平的下降完全归功于中国的成果，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信心。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土绿化方面创造了奇迹。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实现“双增长”，人工造林面积位居全球首位。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7年间，全球新增的绿化面积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塞罕坝、库布其等荒漠化治理典范，不仅让荒原重获生机，也为全球防治荒漠化树立了鲜活的样板。在能源转型方面，中国同样走在世界前列。如今，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不断提升的国际竞争力，正在推动世界能源结构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角色转变：从参与者到引领者

基于深厚的理论自觉和强大的实践能力,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从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强调发展权,到积极参与并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和生效,再到成功主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和《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并引领达成了历史性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已日益走近全球生态治理舞台的中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评价称:“中国在环保国际合作层面展现出领导力”。这一转变,充分证明了中国不仅有能力解决好自身的生态环境问题,更有意愿、有能力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二) 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与绿色“一带一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视野,集中体现在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和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两大实践平台。

1. “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全球实践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不仅是一个理念,更是一系列务实的国际合作行动。中国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通过南南合作,中国尽己所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从非洲的气候遥感卫星,到东南亚的低碳示范区,再到小岛国的节能灯,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效。此外,中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并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

2. 绿色“一带一路”的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出之初,就蕴含着绿色发展的基因。《文选》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必须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中国积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与各方一道,加强在绿色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制定《“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建设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等一系列举措,旨在将绿色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结语

通过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的系统性文本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展现出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实践指引力和全球塑造力。

理论价值层面,该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其核心理论体系,以“两山”理念的价值论为基石,以“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论为方法,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为追求,以“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为牵引,构成了逻辑自洽、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它不仅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更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实践指导层面,该思想为新时代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它所擘画的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为保障、以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突破、以大江大河治理为示范、以绿色低碳转型为根本的实践路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其蕴含的关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等五对重大关系的辩证方法论,为我们处理复杂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确保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攻坚克难中行稳致远。

世界意义层面,该思想超越了国别和地域的界限,为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充满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中国以自身波澜壮阔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向世界证明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

护可以协同并进。通过倡导“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正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引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注入强大动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深入学习和研究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美丽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李昌奎，男，1975年9月出生，山东寿光人。香港产教融合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产教融合、计算社会科学。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兴工路8号美年国际广场2栋930，邮政编码518054。Email: lichangkui@gmail.com, <https://orcid.org/0000-0001-7446-0198>。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3] 邹庆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3期
- [4] HAO Qing, PENG Jian, WEI Ye, WANG Feng-long, YAO Hua-song, LI Yi, WANG Wei, ZHANG Shu-hai, DENG Ling, ZHAO Yun-tai, MA Xue-guang, GE Da-zhuan, DAI Jun-cheng, ZHU He, ZHANG Mao-xin. The connotation of territory and the suggestions of drawing up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9): 2219-2247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0905>

引用本文 李昌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实践路径与辩证方法论研究 [J].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2025, 7(4):1-12. <https://doi.org/10.6914/tpss.070401>.

Cite This Article Changkui LI.(2025). The Theoretical System, Practical Pathways, and Dialectical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Textual Analysis Based on Selected Works o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7(4):1-12. <https://doi.org/10.6914/tpss.070401>

The Theoretical System, Practical Pathways, and Dialectical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Textual Analysis Based on Selected Works o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angkui LI

Hong Kong Integr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elevated to an unprecedented strategic height, becoming both a defining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 fundamental pla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advanced a series of original and systematic ideas,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reby form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elected Works o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 a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and fundamental primary source, provides a solid textual foundation for in-depth study. This paper adopts textual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internal logic and guiding role of this thought: first, it identifies its theoretical system composed of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the holistic view of the community of life, the valu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the vis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second, it outlines the strategic practical pathways i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iver basin governance, and green,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third, it elucidates the dialectical methodology embodied in balancing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targeted campaigns and coordinated governance, natural recovery and artificial restoration, external constraints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as well as “dual carbon” commitments and independent actions; fourth, it explores its global significance in contributing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life on Earth.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itutes a scientific and practice-oriented theoretical system, serving as a fundamental guide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and providing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for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Key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elected Works; Beautiful China; Green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责任编辑: 孙强 Email: wtocom@gmail.com)